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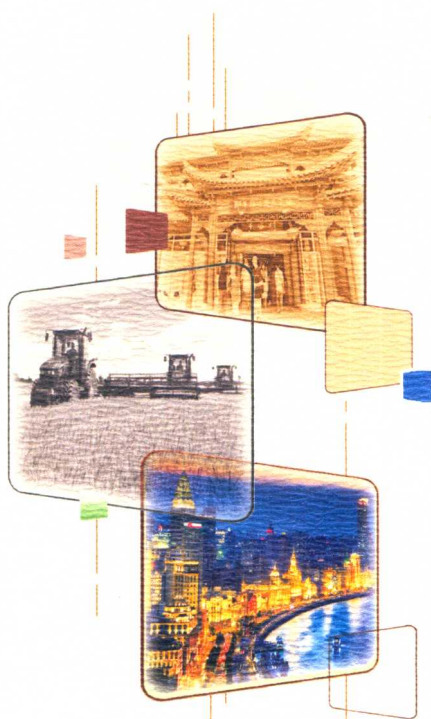
中国近现代 经济与社会 转型研究



王思明 刘馨秋

(美) 罗伯特·道格拉斯·赫特
(R. Douglas Hunt)

主编



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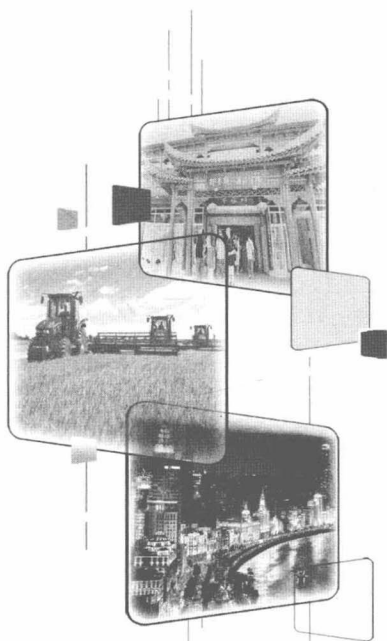
中国近现代 经济与社会 转型研究



王思明 刘馨秋

(美) 罗伯特·道格拉斯·赫特
(R. Douglas Hurt)

主编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转型研究 / 王思明, 刘馨秋, (美) 罗伯特·道格拉斯·赫特 (R. Douglas Hurt) 主编.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16 - 2624 - 0

I. ①中… II. ①王… ②刘… ③罗… III. ①中国经济史 - 研究 - 近代 ②社会转型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F129.5 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3062 号

责任编辑 朱 绯

责任校对 李向荣

出 版 者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010)82106626 (编辑室) (010)82109702 (发行部)
(010)82109709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82106626

网 址 <http://www.castp.cn>

经 销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 张 23.5 插页 8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 阶段成果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编委会

总 编：王思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红谊	卢 勇	包 平	朱 绯
刘 旭	衣保中	严火其	李 明
李 群	沈志忠	陈少华	夏如兵
曹幸穗	盛邦跃	惠富平	曾京京

关于《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

中国有上万年农业发展的历史，但对农业历史进行有组织的整理和研究时间却不长，大致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图书研究部，启动中国古代农业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程。同年，中国农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万国鼎（1897—1963）先生从金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发表了第一篇农史学术论文《中国蚕业史》。1924年，万国鼎先生就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亲自主持《先农集成》等农业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932年，金陵大学改农业图书研究部为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历史组，农史工作从单纯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向科学普及和人才培养拓展，万国鼎先生亲自主讲《中国农业史》和《中国田制史》等课程，农业历史的研究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农业部批准建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被任命为主任。在万先生的带领下，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迅速，硕果累累，成为国内公认、享誉国际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2001年，南京农业大学在对相关学科力量进一步整合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继了自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创建以来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传统，这就是研究院将1920年作为院庆起点的重要原因。

80余年风雨征程，80春秋耕耘不辍，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几代学人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展成为一个特色鲜



明、实力雄厚的以农业历史文化为优势的文科研究机构。研究院目前拥有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专门史、社会学、经济法学、旅游管理等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除此之外，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还编辑出版国家核心期刊、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会刊《中国农史》；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先后投入300多万元开展中国农业遗产数字化的研究工作，建成了“中国农业遗产信息平台”和“中华农业文明网”；承担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农史研究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畜牧兽医史专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形成了农业历史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信息收集和传播展示“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万国鼎先生毕生倡导和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进一步发扬光大。

2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有着整理和编辑学术著作的优良传统。早在金陵大学时期，农业历史研究组就搜集和整理了《先农集成》456册。1956—1959年，在万国鼎先生的组织领导下，遗产室派专人分赴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100多个文史单位，收集了15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成《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共计4000多万字。20世纪60年代初，又组织人力，从全国各有关单位收藏的8000多部地方志中摘抄了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分辑成《地方志综合资料》《地方志分类资料》及《地方志物产》共689册。在这些宝贵资料的基础上，遗产室陆续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麦、粮食作物、棉、麻、豆类、油料作物、柑橘等八大专辑，《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农史研究集刊》等，撰写了《中国农学史》等重要学术著作，为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受到国内外农史学人的广泛赞誉。

为了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加强农史专门人才的培养，2005年85周年院庆之际，研究院启动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文库》推出的第一本书即《万国鼎文集》，以缅怀中国农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万国鼎先生的丰功伟绩。《文库》主要以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科学研究工作为依托，以学术专著为主，也包括部分经过整理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料。《文库》启动初期，主要著述将集中在三个方面，形成三个系列，即《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和《中国作物史研究丛书》。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究院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我们希望研究院同仁的工作对前辈的工作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希望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就历史而谈历史，就技术而言技术。万国鼎先生就倡导我们，做学术研究时要将“学理之研究、现实之调查、历史之探讨”结合起来。研究农业历史，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要关注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为今天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王思明

2007年11月18日

《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序

20 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广泛和巨大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上，中国经历了从满清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变迁；在经济上，中国由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被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再由计划经济逐步迈向市场经济，中国由一个纯粹的农业国逐渐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原来的 90% 下降到 13%，农业就业由清末的 90% 下降到今天的不足 49%；在社会结构方面，中国由原来的农业社会逐步迈向城镇社会，城市化的比重由清末的不到 10% 攀升到 44%。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迁无疑对农业和农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认真探讨过去一百年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加深我们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对加深我们对目前农业与农村存在问题的理解及制定今后进一步的改革方略也不无裨益。有鉴于此，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自 2002 年开始启动了“中国近代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项目。这一系列研究以清末至今农业和农村变迁为重点，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过去一百年，中国农业生产与技术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发生了哪些结构性变化？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民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造成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如何，动因与动力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差异的历史成因；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互动关系的



发展，等等。

经过几年的努力，部分研究工作已按计划结束，形成了一些成果。为了让社会共享，也为了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决定推出《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本丛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农业与农村变迁置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而不是人为地将近代与现代割裂；二是不单纯地就生产而言生产，而是将农业生产及技术的变迁与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变迁做综合分析和考察。目前，全国各地正在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但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舍建设，它包括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从国情出发，既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又重视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

美国著名农史学家斯密特（C. B. Schmidt）认为“农业史的研究对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政府有关农业的行动应建立在对农业经济史广泛认知的基础之上”。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泰勒（H. C. Taylor）博士也认为历史研究有助于农业经济学家体会那些在任何时期对农业发展都可能产生影响的“潜在力量”。我们希望《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的出版对我们认清国情、了解今天“三农”问题历史成因有所帮助，对寻求走中国特色农业与农村发展的道路有所贡献。

王思明

2007年11月于南京

前言

2015年10月11~13日,由中国南京农业大学、美国普渡大学联合主办,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的首届“普渡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研究联合中心”(Purdue University-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int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简称PNJCCS)学术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成功举办。

此次论坛的研讨主题为“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转型”,议程包括10月12日上午的开幕式及大会主题报告、12日下午和13日的分组讨论。论坛开幕式由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教授主持。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徐翔教授致欢迎辞。美国普渡大学历史系主任赫特教授(R. Douglas Hurt)和韩国釜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崔德卿教授(Choi Duk-kyung)分别代表美、韩历史学会致辞。论坛还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庆祝PNJCCS的成立。

来自美国普渡大学、韩国釜山大学、中国南京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博物馆等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根据学术交流和论文提交情况,研讨内容大致可分为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中外农业的交流与碰撞、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等3个方面,现分述如下。

一、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当前,近现代中国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在本次论坛中,学者们从农业、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对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进行了多角度的细致阐述。

普渡大学的赫特教授(R. Douglas Hurt)作了关于中国“绿色革命”的报告,分析了自20世纪早期以来中国农业转型过程中“绿色



革命”的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及其与中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关系。他认为“绿色革命”并不仅仅依靠农业科学，还依赖政府在粮食价格、化肥购买补贴、灌溉系统发展以及科研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中国的绿色革命》一文中，赫特教授在肯定“绿色革命”为中国带来粮食保障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绿色革命”在食品安全、公共健康、国际贸易等方面导致的一系列后果的担忧。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王思明教授作了关于 16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和农业发展的报告，从整个世界与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角度探寻了中国农业发展演进和衰落的原因。他认为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并于 19 世纪初期到达世界顶峰，其主要支撑体系就是中国的农业，而且中国农业生产的相对优势一直保持到了 19 世纪中期，其中土地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大体维持到了 20 世纪。中国传统农户经营制度并未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障碍。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应从世界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来分析。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日新月异的进程中，中国不思变化、固守传统，终于导致在新一轮世界性竞争中落到了后面。在《经济转型与农业发展——论明清以来的中国农业》中，他还指出了当前中国农业正面临来自土地经营方式、农村人口转移、城乡差距、农村环境等方面的新挑战。

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姜萍在《传媒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社会形象变迁研究——基于〈人民日报〉30 年来转基因报道的计量分析》中，基于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1979—2010 年的转基因新闻报道，通过数据考察了主流报纸媒体反映的转基因技术社会形象的变迁历程、动因和问题。她认为，中国媒体反映的转基因技术社会形象由“技术不断取得进步的、带来较多利益的正面形象”逐步演变为“在新技术、医药和农作物领域经济前景美好的、收益大于风险的正面为主、兼有负面的形象”，而这一变化是由政府政策、经济利益、技术创新、争议性媒体事件以及媒体报道的方式和语言等因素导致的，提出通过媒体的科学传播，客观、理性地塑造转基因技术的形象。

南京师范大学郭爱民教授的《世界经济史上现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英格兰的比较》，从农户生产能力增长的角度考察了近现代中国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并与英格兰进行

比较，分析英格兰在工业化时期（1700—1880年）如何完成了社会转型，而中国长三角地区在1840—1940年的转型又因何失败。他认为，在工业化时期的英格兰，以农民生产能力的增长为基础，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大多数农业人口逐渐脱离农业，进入工业等行业，为农业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使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原工业化转化为以大生产为主体的工业化成为现实；较低的恩格尔系数，使农家除了吃饭以外，有较大的能力消费工业品，拉动工业经济的增长；家庭的剩余成为生产消费的保障，农民自身发展的桥梁。1840—1940年的长三角，由于农民的生产能力停滞，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几无增长，直到20世纪40年代，农业人口仍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仍以地块分散的小农场为主，乡村手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贫困型的恩格尔系数，使农家的绝大部分开支用于吃饭，对工业品的内需难以启动；由于家庭剩余为负数，农业生产消费水平低下，农民自身的发展难以确保。农民生产能力增长的程度，是工业化时期英格兰和1840—1940年长三角社会转型与否的根本原因。

普渡大学克莱恩（Wendy Kline）和田梅（Margaret Tillman）关注中国近现代医疗情况的发展。在《“赤脚医生”之前：战后中国助产和医疗培训项目的建立》一文中，克莱恩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医生和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实施的医疗培训项目，并特别关注助产和分娩领域。她详细阐述了斯坦福大学的胸腔外科医生埃罗塞尔（Leo Eloesser）在中国北方农村建立的医疗培训项目，评估了该项目对中国和美国社会的影响。田梅副教授则重点关注保育工作，在《红星照耀的孩子》一文中，她从美国援华会和中美沟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策、女性文化的改革、培训保育员等方面讨论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保育工作问题，从普通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角度阐述了美国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并强调中美关系良好发展的历史。

同样来自普渡大学历史系的罗伯茨（Randy W. Roberts）教授着眼于中国体育与外交之间的关系，他在《软外交：中国的体育世界》一文中通过分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乒乓球队及其命运的影响，探讨中国如何将体育作为国际关系的工具成功获得国际声望，总结了乒乓球运动在外交中所起到的作用。

近代中国教育也曾发生重要变革。1901年清政府宣布改书院为



学堂，此后几年全国至少有1 600所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被近代学堂所取代。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王勇、詹秋萍的《从岳麓书院改制看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即以岳麓书院改制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教育从书院到学堂的近代转型，分析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与影响，同时反思书院改制，指出自由研修制度和人文主义精神是晚清书院教育的两大弊端，并提出了借鉴书院优秀传统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议。

二、中外农业的交流与碰撞

美洲作物的引种与推广一直是农史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美洲作物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种植结构和饮食结构，而且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杨坚在《玉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考述》中提出，玉米的传入直接迎合了清代的人口增长，缓解了人口激增与粮食生产之间的矛盾，玉米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粮食种植结构最大的改变，同时玉米也是整个饲料工业的基础。

除了玉米以外，南瓜在中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李昕升即以南瓜为研究对象。他在《民国时期南瓜的生产技术》中探讨了民国时期南瓜生产技术的发展。他认为，中西合璧是民国时期南瓜生产技术的特色，在近代农学影响下，南瓜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等技术水平得以迅速提升。在《中国的南瓜产业发展（1949—2014）》一文中，他重点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南瓜的生产情况，分析了南瓜产业发展的驱动力，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

传播与交流是双向的，中国的粮食作物传入美国，同样也为美国农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刘琨、李群教授的论文《美国引种中国粮食作物活动研究（1908—1924）》即着眼于此，他们以1908—1924年美国农业部公布的219篇《国外引进作物公告》为参考资料，认为20世纪初期美国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原因是联邦政府采取有效的农业发展政策，其中从国外引种粮食作物是农业生产水平质变的关键手段。在美国农业部主导下，哈

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聘请植物学家、农业传教士和农业学者在中国开展了长期的粮食作物采集与引种活动,获取大量的稻类作物、麦类作物、豆类作物和其他重要经济作物样本。这些中国粮食作物不仅解决了美国农业生产中种质资源缺乏问题,而且持续扩充了美国种质基因库样本数量,为美国跃居世界农业生产大国首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普渡大学历史系的张瑞胜对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作了深入研究,他特别关注“作物改良合作计划”。该计划是1925年金陵大学农林科长芮思娄教授聘请世界著名作物育种专家、康奈尔大学洛夫担任金陵大学特聘教授,随后金陵大学、康奈尔大学及纽约洛氏教育基金世界教育会三方订立的中美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在《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研究(1925—1931)》中,作者详细阐述了康奈尔大学和金陵大学之间为期五年的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历史背景、实施目的、主要成就、意义与影响,认为该计划是中美双方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开启了现代农业科技与中美合作的新时代,树立了农、科、教三结合的典范,对推进中国农业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惠富平教授、巢湖学院过慈明教授以肥料为媒介,探讨近代东西方农学交汇的过程。他们在《民国时期中西肥料交锋与传统有机肥的推广举措——以江浙地区为重点的考察》中指出,随着西方化肥输入、销售和施用的增加以及相关生态、经济危害的显现,化肥的优劣利弊引起了国人的激烈争论,豆饼、骨肥、绿肥、厩肥等本土有机肥的价值也得到重新认识和肯定。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江浙等地采取多种措施推广传统有机肥的施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汇背景下,西方舶来化肥与本土天然肥料冲突的结果。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沈志忠教授的《近代中美土壤肥料科学交流与合作探析》,将研究重点放在中美之间的土壤肥料科学交流方面,他把近代以来以美国来华农业专家和中国农科留美学生为主体的研究人员在中美两国土壤肥料科学的交流与合作所作出的贡献总结为:(1)成立了土壤肥料研究机构,培养了土壤肥料科学人才;(2)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土壤调查;(3)运用近代科学



方法,进行了我国首次大范围的地力试验;(4)开展肥料试验,促进中国化肥工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土壤肥料科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华东大学杨小明教授、太原科技大学杨常伟在《穆懿尔在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中的贡献研究》中从人入手,他们将穆懿尔作为近代山西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中一个典型代表,认为在中美农业科技中,穆懿尔认真考虑该地区的优势和客观地理条件,收集土壤样本进行化验分析,其土壤分类工作为指导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结合山西自然条件特点,有针对性地挑选和改良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优良作物和畜禽品种,引进及改良的品种很快在各地推广应用,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教学和科研实践相结合,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山西现代意义的农业学校教育得到发展。穆懿尔积极参与近代中国作物、畜禽品种的引进与改良的做法也展现了众多中美农业科技交流学者的共性。

三、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漫长的农业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韩国釜山大学崔德卿教授的论文《明清江南地区的肥料和粪尿》讨论了明清时期中国江南地区的粪肥问题,对粪尿在东亚地区广受重视的背景及得以推广的动因进行了探析,对粪尿利用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认为,19世纪以来粪尿处理与卫生问题间的矛盾愈发显著,需要通过当前的科学再处理技术去解决。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建革教授注重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他在《水利、技术、景观与江南生态文明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从水利生态经验与现实、土壤肥力培养经验、传统的景观利用3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江南生态文明的历史经验。他认为在江南的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有3点特别值得借鉴:一是掌握了水流平衡的水利生态技术和河道弯曲蓄水技术,使水网系统水流周流,灌排有序,农田百年不灾;二是精耕细作和重视生态循环的农业技术,特别是桑基农业的生态循环技术和稻作农业的水稻土培肥技术;三是传统的审美意识对

园林和一般田野景观的改造。

动植物谱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门记录动植物品种和种植、养殖技术的专著，极具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华南农业大学魏露苓教授的研究即围绕专门记录岭南地区兰花品种和栽培技术的《岭海兰言》而展开。她在《广东兰谱〈岭海兰言〉研究》中着重分析了《岭海兰言》的特色与科学价值，认为该书具有不落俗套的独创性、中西合璧的兼容性、物质资源的特殊性、栽培技术的实用性以及岭南玩家的多元性，书中所记的品种与栽培技术对岭南园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衣保中教授、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部马伟在《试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产业化》中，分析了东北近代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当前农业产业化带来的启示。他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出路，就在于农业规模经营和企业化生产。规模经营可以使土地、劳力、资金、工具等生产要素实现合理搭配，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和结构，使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达到最佳状态。规模经营还可打破现在小农经济的种种弊端，促进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乃至企业化，促进农户实行经济核算，增加物质和资金投入，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建立高效农业新格局，从而突破小农经济的藩篱，过渡到现代化大农业。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施由明研究员的论文《论清末新政与近代农业试验——以江西为例》，对清末新政中的江西近代农业试验进行了全面阐述，肯定了其在商品性农业发展、乡绅的近代转型以及传统农业管理模式的近代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他认为，清末新政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开启了中国农业走向近代化的步伐，是近代农业的开端和推广了近代农业科技知识，是中国农业史上一个有特定意义的阶段。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王思明教授、刘启振在《胡先骕农业思想及其现实启示》中，将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的农业思想概括为5个方面：农业为促进人性发展的最佳职业；土地政策为国家经济命脉，应包括限田、均税、规定农田分割的极限以及减租等四项要政；积极推进农业合作事业，大力发展农业金融；提倡注重经济植物学研究，充分利用我国植物富源；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方法多方努力发展农业生